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1 June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nd French

2020年6月10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06年6月8日星期一召开的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视频会议上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所作通报的副本, 以及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非、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也发了言。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病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 这些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尼古拉·德里维埃(签名)



附件一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我上次于2019年12月在安理会发言时(见S/PV.8681),世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我坐在各个代表团对面,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马蹄形桌子的一端提交我的报告。当时,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准备在今年年底前结束其正在审理的司法案件,仅余潜在上诉工作待处理。当时,我们正准备根据安理会最初的设想,把我们的重点转移到较长期的余留职能上。

可悲的是,全球没有一个角落幸免于这一可怕的大流行病,今天,当我在海牙的电脑屏幕上向安理会发言时,我必须承认,我强烈感受到安全理事会赋予我的责任的分量。这其中包括我对余留机制被告、被拘留者和被定罪者的责任,他们正在非洲和欧洲等待诉讼或服刑、我对受害者和证人,包括生活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受害者和证人的责任、我对来自75个不同国家的余留机制专职工作人员的责任以及我对安全理事会乃至整个联合国的责任。

可悲的是,全球没有一个角落幸免于这一可怕的流行病,今天,当我在海牙的电脑屏幕上向安理会发言时,我必须承认,我强烈感受到安全理事会赋予我的责任的重量。其中包括我对余留机制在非洲和欧洲等待诉讼或服刑的被告、被拘留者和被定罪者的责任;我对受害者和证人,包括生活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受害者和证人的责任;我对来自75个不同国家的机制专职工作人员的责任;以及我对安全理事会乃至整个联合国的责任。

去年12月提出的预测没有考虑到一场将实际使世界陷入停滞的全球大流行病因素。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余留机制仍保持运作,并取得了成果。履行了与审查余留机制任务授权相关的报告职责以及其他定期职责。尽可能减少了中断,法官和工作人员在幕后努力工作,确保法庭恢复活动做好最大准备。最重要的是,追捕逃犯的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

安全理事会面前摆有余留机制编写的几份全面文件,以便审查我们的工作进展。我们感谢为我们反思成就,并确定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效率的领域提供了机会。

过去几个月,余留机制的主要重点是确保其司法职能不间断地继续下去。为此,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法律框架中的已有工具,并酌情调整了内部程序。此外,尽管疫情影响了庭审工作,但是,由于我们的许多司法活动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案件取得了进展,几乎没有中断。尽管如此,原本今年年底有望结案的案件现在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结案。

在这方面,我可以提及在海牙对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的审判,在该案中,与冠状病毒病(COVID-19)有关的限制使西马托维奇案的辩方举证法庭活动在进入到一半时陷入停顿。预计听证会将于7月7日恢复,所有证人将在今年年底前出庭。预计将于2021年4月做出审判判决。

同样,在姆拉迪奇案中,原定于3月举行,但由于姆拉迪奇的手术而推迟到6月举行上诉听证会最近由于疫情不可避免的影响被推迟,时间待定。与此同时,工作仍在继续,上诉分庭随时准备好一旦安全、可行就听取姆拉迪奇案的上诉。上诉判决预计在上诉听证后九个月做出。

在阿鲁沙分支，独任法官将检察官诉马克西米利安·图里纳博等多名被告藐视法庭案的审判推迟到8月底。这也是由于旅行和其它限制措施阻止了分处三个不同大陆的关键人物——包括被告及其律师以及证人——的行动。尽管如此，审前诉讼和审判准备工作仍在进行，预计将于2021年3月做出审判判决。

尽管遗憾的是，这些延误超出余留机制的控制范围，但请放心，我们正在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尽快处理和完成这些案件。

还必须根据本报告所述期间的重大突破来重新评估我们的工作量。我指的是逃犯菲利西安·卡布加先生的被捕。卡布加先生和其他人逃避抓捕已有20多年，直到目前为止，逃犯审判更多的是一个应急计划，而不是我们行动的主要部分。布拉默茨检察官和他的团队在我们任务授权中这一期待已久的核心方面取得了成果。他们的努力应该受到表扬。法国与其他会员国和伙伴一道，为这一伟大成就做出了贡献，值得我们赞扬。同样，必须感谢和祝贺所有协助余留机制确认另一名逃犯奥古斯丁·比齐马纳先生已经死亡的人。

我禁不住想，如果这些成就体现的合作和信任继续下去，还有多少逃犯可以被绳之以法。让我们不要止步于此。让我们利用这一势头，继续推进国际司法事业。

相比之下，阿鲁沙9名被判无罪释放者和已释放者的情况则比较暗淡。正如我以前说过，而且实际上正如安理会在几项决议中承认的那样，余留机制无法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依靠安理会成员的善意和承诺。每个报告期对我们来说都过得很快，但对这九个人来说无疑是无止境的拖延，其中一个人自2004年以来就一直在不确定中煎熬。我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一共同失败只会削弱对我们制度的信心，破坏其他成功。因此，我再次敦促安理会予以支持，帮助结束这种难以维持的局面。

我现在要谈谈提前释放问题。如第2422(2018)号决议所反映的那样，这是安全理事会特别关心的一个领域，我也认为它非常重要。上个月，为了确保更高的透明度、更多的协商和更大的一致性，我发布了经修订的关于赦免、减刑或提前释放申请程序的《程序指示》。我相信，这些修订将有助于澄清所涉程序，并确保相关过程得到简化，同时顾及一点，即收集更全面的信息，使裁决有据可依。在对程序的改进中，有两处实质性改动，它们反映了余留机制现有的提前释放资格门槛，以及主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批准提前释放的固有酌处权。

泛泛地谈一下在COVID-19大流行情况下判决的执行问题，我积极采取措施，要求各执行国定期就被我们定罪的人服刑的各个监狱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信息。按照我2020年4月24日的命令，我每两周收到一次最新信息。同样，我也要求提供有关余留机制在阿鲁沙和海牙的拘留设施情况的信息。鉴于被我们指控、拘留和定罪的人的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我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极其密切地关注这些事项。同时，我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执行国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不幸的是，COVID-19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病毒。在我们共同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危机带来的挑战之际，我们绝不能忽视地方性仇恨、隔阂和否认的危险。我们必须坚定地面对那些支持有罪不罚而非伸张正义的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们回顾了我们集体历史上不光彩的两页。去年是卢旺达境内发生的针对图西族的灭绝种族事件25周年，而今年则是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25周年。虽然我们不知道，并非每种病原体都会引发大流行病，但我

们每天都看到, 这些破坏性势力正变得更加恶毒, 仇恨传播者感到有恃无恐。我们必须驳斥它们对相关事件的描述, 并向所有曾经和仍在受害的人表示声援和支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 余留机制将参加下个月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25周年的活动。我非常希望所有会员国都会纪念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庄严无比的时刻。

虽然余留机制被要求制定一条与以前宣布的不同的路线, 但我要自豪地说, 我们已经受住这一挑战。诸位面前的报告所述的任何进展都离不开我们敬业的法官、工作人员和所有每天为余留机制工作做出贡献的人。我感谢并赞扬他们在这过程中、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中所做的奉献和出色努力。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时期, 我们才会想起, 自己生命中的那些人——即家人、亲人和同事——特别重要。

最后, 我谨感谢所有会员国今天对余留机制的关注及其对该机制的不懈支持和帮助。我期待下次我们可以安全地举行面对面的会议。

附件二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的发言

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理会介绍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办公室的活动。

我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我们在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与我们战略优先事项有关的活动及所取得的成果。今天，我谨着重谈及几个重要问题。

自我上次汇报情况(见S/PV.8681)以来，最重要的进展是，我们现已查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三名主要逃犯中两名的下落。5月16日，法国当局在巴黎逮捕了据称是1994年卢旺达境内对图西人实施的灭绝种族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头号通缉犯之一菲利西安·卡布加。这是我的办公室自2016年以来修订跟踪战略、加强努力的结果。

如我以前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我们已经从对线人提供的线索作出反应，转向进行更加积极主动、以分析为导向的调查，因为事实证明此类线索并不可靠。我们还针对每个逃犯制定了具体的策略。

对于卡布加，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把工作重点放在他居住在西欧的家人身上，因为我们得出结论，他们很可能是卡布加的支持网络。通过调查和排除不可行的线索，我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比利时和法国的可能地点。

今年年初，我们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整理和分析从有关国家当局获得的大量数据，我们得以确定以巴黎附近Asnières-sur-Seine的一个特定居民区为中心的家庭成员出行规律。

我们随后与法国当局联系，后者证实了我们的情报，并设法确定了卡布加据信藏匿的具体地点。我们共同策划了一次复杂、协调的逮捕行动，并于5月16日上午成功实施。

我谨对法国及其当局，特别是打击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中央办公室以及巴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供的非同寻常的合作表示最深切的赞赏和感谢。

一个相关的事态发展是，5月22日，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确认，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通缉的另一名主要逃犯——即临时政府前国防部长、据称是1994年灭绝种族事件高级头目之一的奥古斯丁·比齐马纳——已经死亡。比齐马纳之死的确认，同样是我们这几年修订战略、加强努力的结果。在研究了所有可用情报后，我们估计比齐马纳很可能已经死亡。然后，我们积极致力于验证这一假设。

在美国武装部队DNA鉴定实验室和荷兰法医研究所的协助下，去年年底，我们确定在刚果共和国黑角港发现的人类遗骸与从比齐马纳母亲那里获得的参照样本相匹配。随后，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排除了这具遗骸属于比齐马纳母亲的任何男性亲属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比齐马纳已经死亡，并将于近期提出动议，正式终止对他的诉讼。

这些成功是我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必须是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他们伸张正义的要求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使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

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全力支持我们过去几年的持续努力，一再呼吁所有会员国为搜查逃犯提供合作，而安理会成员国和其它联合国会员国则帮助我们获取我们推动调查所需的情报和信息。

一长串的会员国提供了尤其重要的帮助，但是每个会员国都应得到认可。因此，我谨代表检察官办公室，特别感谢奥地利、比利时、刚果共和国、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卢旺达、瑞士、联合王国以及美国执法和司法当局的贡献，也感谢欧洲刑警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我们的共同努力再次证明，通过国际合作可取得斐然的成绩。

最后，这些结果要归功于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才干与奉献，他们始终展示出最高水准的专业素质。

现在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查找并抓捕剩余的逃犯。前几周营造了重要势头。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利用这种势头，发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所有逃犯将被追究责任的明确信息。

检察官办公室继续积极推进有前景的调查。我们掌握有关所有六名逃犯下落的可信线索。卡布加被捉拿归案清楚地表明，我们取得更多成功的关键因素将是会员国的合作。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假如2018年8月我们曾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合作的话，本会多抓获一名逃犯，这一点令人遗憾。我们继续与南非当局接触，相信它们将对我们的持续请求做出迅速和充分回应。检察官办公室报告过我们在争取合作方面遇到的许多其它挑战，我们的许多请求被置之不理，无人答复。

非洲联盟（非盟）响应安全理事会的一再呼吁，鼓励其所有成员国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以抓捕剩余的逃犯。检察官办公室相信，今后所有非盟成员国将把我们的援助请求作为优先事项，确保我们得到完成我们重要任务所需的支持。我们理应为1994年卢旺达境内对图西族实施的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做出最佳的集体努力。

在审案和上诉方面，我的书面报告提供了我们在报告所述期间各项活动的细节。我谨重申，我们致力于采取我们可控的一切步骤，以加快完成这些审理工作。

鉴于全球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恢复对检察官诉马克西米利安·图里纳博等人案、斯塔尼希奇、西马托维奇和姆拉迪奇案的庭审将由各分庭决定。检察官办公室强调，我们愿意考虑尽快恢复听审的一切可能。现在我愿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法庭内的审理已暂停，但是在法庭外检察官办公室仍在继续所有案件的全面起诉工作。我们继续登记和回复大量动议。我们还借此机会推进我们负责的其它领域的工作，包括准备图里纳博一案审案文件的提交及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一案的最终审案摘要。在姆拉迪奇一案中，我们的团队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以便能够在安排上诉听审后尽快做出口头陈述。

检察官办公室还继续回复国家当局提出的援助请求。在报告所述期间，我们收到大量援助请求。我们充分预计未来将收到甚至更多的请求。

因此，尽管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远程工作安排，检察官办公室仍有效确保了业务的完全连续性。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不顾严峻的挑战，继续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随着菲利西安·卡布加被抓捕归案，还必须提醒我们自己，起诉被控的战争罪犯不是司法进程的终点。对于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认可和承认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正如我一再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否认犯罪和美化被定罪的战斗犯仍是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卢旺达侨民界，仍有人协调一致地努力否认卢旺达灭绝种族罪。有些人鼓吹尽可能缩小灭绝种族罪规模的篡改说法。其他人则继续否认曾经发生旨在全部或部分消灭图西族的犯罪。

否认犯罪和美化被定罪的战斗犯在前南斯拉夫各地也普遍存在。遗憾的是，推动或支持否认与美化的常常是该地区的政治人士和公职人员。

我先前报告过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战争罪司法的政治干涉。就在上周，我们亲眼看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这种干涉的惊人实例。

我的办公室始终全力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及其现任首席检察官。我们始终的感受是，她和她的团队专业地履行职责，坚持操守。我们相信，他们将继续起诉所有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者，无论其族裔或官方身份。这个例子尤其突出，同时整个该地区否认、美化和政治化的氛围让检察官和法官感到寒心，削弱了法治。

今年将是前南斯拉夫冲突中许多知名罪行和事件、包括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行为的二十五周年。这些周年纪念应成为纪念受害者、用同一种声音谴责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灭绝种族罪责任人的庄严时刻。检察官办公室呼吁该地区的所有官员和公众人物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把受害者和平民的痛苦摆在所有周年纪念活动最显著的位置。他们应公开谴责否认犯罪和美化战斗犯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公开言论和资金来给予支持。二十五年过去了，早就应该摆脱过去的言论，急需发挥领导作用，支持和解与建设和平。

最后，随着菲利西安·卡布加被抓捕归案，奥古斯丁·比齐马纳确认死亡，三名卢旺达主要逃犯中的两人已有下落。现在，检察官办公室坚定地侧重于查找剩下的主要逃犯普罗台斯·姆皮拉尼亚和依然在逃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五名其他逃犯。正如近期事件所再次证明的那样，凭借会员国及时和有效的合作，这些逃犯就能够被抓捕归案。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准备提出多项援助请求，并将与有关会员国联络以寻求支持。现在与以往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发出明确的信息，即：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不仅是法律上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也是对受害者和幸存者应尽的道义义务。

此外，我们仍然致力于高效和有效地履行我们的其他职能。尽管发生COVID-19疫情，但我们仍有效地确保继续全面开展工作。我们继续积极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案件诉讼，并为在国家法院进行的战争罪案件审理工作提供全面支持。

在这方面，检察官办公室欢迎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确认我们致力于落实安全理事会对余留机制作为“一个小型、临时和高效机构”的愿景。监督厅还积极评价了我们的工作和创新方法，包括我们灵活部署工作人员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特设司法活动，同时保持精简人员配置。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继续支持我们的一切努力。

附件三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的发言

我感谢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的通报。

我还对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两名工作人员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去世表示深切哀悼。

5月16日将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史上重要的日子。由于检察官办公室几年前启动的经修订的搜查战略,也由于国际刑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和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主管当局提供的援助和支持,2011年因涉嫌于1994年在卢旺达犯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而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菲利西安·卡布加,在逃亡近23年后,终于被法国当局逮捕。

我们祝贺检察官及其团队以及所有相关的国家和组织取得这一成功,这是余留机制历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里程碑。这一成功向战争罪犯——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发出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了。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最严重违法国际法罪行不受惩罚现象。国际社会将不断尽其所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即使犯罪事件过去了20多年也未作罢。

余留机制的这一成功使我们有机会更加明确地强调一项原则,我们认为这项原则对于安全理事会在司法领域必须继续采取的办法至关重要。只有各国不仅相互合作,而且还与国际性的法院和法庭合作,才能有效起诉犯有暴行罪者。正因为如此,《余留机制规约》和安理会若干项决议规定,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同余留机制充分合作,这是一项基本原则。

在这方面,比利时再次关切地注意到,在搜寻和逮捕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剩余六名逃犯方面,检察官办公室一直难以从一些相关会员国那里获得必要的合作。我们大力鼓励这些国家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从而参加促进伸张正义和有罪必究的集体努力。我欢迎南非代表刚才在这方面作出的承诺。此外,在重新安置目前居住在阿鲁沙的9名被判无罪或获释人员方面,各国也必须给予更大的合作。

今年,我们纪念若干悲惨事件发生二十五周年,其中包括标志着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的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在这方面,我们特别遗憾地在检察官办公室的报告(S/2020/416,附件二)中再次读到,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否认罪行和美化战争罪犯仍然是一个现实。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地区司法合作,这一合作处于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比利时呼吁相关各国当局根据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价值观和原则,把起诉战争罪犯以及打击仇恨言论和任何鼓吹歧视的意识形态作为优先事项。

最后,我谨欢迎余留机制努力尽量限制COVID-19疫情对其活动的影响。比利时还赞扬余留机制主席在提前释放问题上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导致最近对这方面适用的指示进行了修改。

余留机制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族群间和解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比利时重申全力支持余留机制,希望看到其任务期限延长到6月30日以后。

附件四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谨感谢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上午所作出色通报。

显然,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 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祝贺阿吉乌斯主席及其工作人员努力确保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工作持续进行。适应新常态对于余留机制按计划履行任务授权具有根本意义。

此外, 我们谨强调余留机制为消除COVID-19疫情对其工作人员和工作量产生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我们赞扬阿吉乌斯法官采取措施, 为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工具来抗击疫情。他正在做一项令人振奋的工作。

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努力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其工作和活动。我们希望因COVID-19疫情而推迟的促进性别平等的活动不久将得到恢复。我们鼓励余留机制继续做以下这项了不起的工作: 就这些问题对工作人员和其他人进行教育。

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审案工作取得的进展持积极看法, 并因此鼓励余留机制继续力求实现其在这方面的2020年目标, 尽管COVID-19疫情可能造成延误。此外, 我们高兴地听到, 关于更新“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或余留机制定罪者的免刑、减刑和提前释放申请的决定程序的做法指示”的协商进程已处于最后阶段。

请允许我提及一个关键点——合作的重要性。像所有其他国际性法庭一样, 余留机制需要各国给予合作。若无各方的共同努力, 余留机制就无法实现其任务授权规定的目标。我们有义务同余留机制充分合作, 尤其是在调查期间。实际上, 各国同余留机制成功合作产生惠益的一个极佳例子是菲利西安·卡布加被捕。我们赞扬法国当局和检察官办公室合力取得这一重要成果。

多米尼加共和国重申对余留机制的承诺, 全力支持将余留机制主席和检察官的任期延长到2020年6月30日以后。多米尼加共和国认为, 在打击于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和针对图西族人犯下的灭绝种族罪不受惩罚现象的斗争中, 余留机制的作用至关重要。受害者遭受了可怕的损失, 我们必须为他们伸张正义。

附件五

爱沙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斯文·于尔根松的发言

我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向安理会提交的详细报告(S/2020/309, 附件)以及他们今天内容翔实的通报。

爱沙尼亚赞扬该机制在报告所述期间在海牙和阿鲁沙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进展,包括在当前非常情况下旨在尽量确保业务连续性的所有努力。我们注意到,为遏制这一大流行病蔓延而采取的限制对结案的时间表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会将所有延迟保持在最低限度。

我们也注意到该机制在以下各起案件中的工作:当前的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审理,拉特科·姆拉迪奇案的上诉程序以及涉及多名被告的检察官诉马克西米利安·图里纳博等人案,现在还有恩吉拉巴图瓦雷蔑视法庭一案。我们还欢迎该机制的其他活动,包括与其统一存档系统和该系统的公共接口——统一法院记录数据库——相关的活动,建立这个系统是为了让公众能够查阅司法记录。我们还认识到为处理该机制工作人员性别均等问题而采取的举措以及为消除骚扰而采取的措施。

国际刑事司法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继续取决于集体努力。在法国当局于5月16日逮捕菲利西安·卡布加之后,被称为卢旺达灭绝种族资助者的卡布加先生最终要为26年前犯下的罪行面临法律制裁。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以及许多国家和国际实体,如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坚决提供援助。我们现在强烈敦促会员国提供必要援助,以便其余六名逃犯能够被捕并受到审判。

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所作努力的实质是伸张正义和向受害者提供救助。去年,我们纪念了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二十五周年,下个月我们将纪念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事件二十五周年。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知道,当杀戮发生时,国际社会几乎没有采取行动来加以制止。因此,安理会今后必须做得更好,才能防止和应对类似的可怕罪行。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协助各国和个人更好地履行永不再犯的承诺。爱沙尼亚继续支持该机制的工作,支持延长其任务期限。

附件六

法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安妮·盖冈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我也要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发言。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感染冠状病毒后丧生的该机制工作人员表示哀悼。

在我们开始对该机制工作进展进行第三次审查之际，法国重申全力支持该机制，并赞扬它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维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遗产的贡献。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该机制的工作。

来自该机制的一个重要消息是，菲利西安·卡布加先生于5月16日在巴黎市郊被捕，从而结束了20年来对这名嫌犯的搜寻。如果没有欧洲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各国政府之间以及与余留机制的密切国际合作，就不可能实施这次逮捕。这揭示了该机制的现实意义和活跃度，它继续承担着调查和事实认定的工作和责任。

这是卢旺达受害者、卢旺达民族和解和国际刑事司法的重要时刻。在确认奥古斯丁·比齐马纳先生死亡后，将其余六名嫌疑人绳之以法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再次呼吁各国根据其国际义务，不受阻碍地与该机制合作。

关于提交给国内法院的案件，法国重申正全力在合理时限内结束巴希巴卢塔案审理。我们的重要目标仍是确保灭绝种族罪不会逃脱惩罚。因此，我们的努力包括加强司法机构起诉居住在法国的卢旺达图西族灭绝种族参与者的能力。我们还充分注意到卢旺达司法机构最近对拉迪斯拉斯·恩塔干兹瓦先生的定罪。

最后，不承认罪行和责任，就不会有持久和解。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在前南斯拉夫和整个地区冲突结束二十年后，美化战犯的现象正在蔓延，在一些情况下，某些国家和地方当局的公开支持助长了这种现象。在一些重要纪念活动即将举行之际，我们呼吁所有责任方停止否认国际刑事法院认定的罪行和责任。

附件七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穆赫辛·斯伊哈伯的发言

首先,我要转达印度尼西亚对该机制的慰问,尤其是对最近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去世的该机制工作人员的家属。我们挂念着他们。

我们谨借此机会感谢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的报告(S/2020/309,附件)和通报,也感谢他们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刻发挥领导作用并致力于执行各自的任务。

我还要重申,印度尼西亚致力于继续与该机制合作,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支持其活动。

今天我将集中讨论三个问题。

我要谈的第一点涉及该机制的审查进程。印度尼西亚鼓励该机制在阿吉乌斯法官的领导下继续努力,确保有效、高效和及时地完成余留的司法程序。

我们还注意到该机制的意见,即由于COVID-19大流行病,原本预计到2020年底完成司法案件的时间表已经改变。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鼓励该机制继续作出创新调整,以执行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建议,特别是提出明确、重点突出的预期完成时间表。这将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同时保证迅速完成司法程序,还要保持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最高标准。

我要谈的第二点关于该机制活动的进展。印度尼西亚欢迎该机制在履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重要余留职能方面取得的进展——这要归功于主席、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承诺和奉献。

本报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在执行判决、保护受害人和证人以及行政和档案管理方面的工作也是如此。

我们也欣见有望取得更多进展,仍然相信报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的运作情况会得到积极评价,并期待在此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取得更多成就。

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最后一点:国家的合作。印度尼西亚谨借此机会赞扬检察官办公室所作的努力,当然还有相关国家继续与余留机制合作的具体努力,特别是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逃犯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卡布加先生的被捕证明余留机制有能力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同时强化了没有人能够逃脱正义制裁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要呼吁各国,特别是那些仍有逃犯疑似藏身的国家,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加强并强化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合作。

最后,我要重申,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加强法治和促进正义,支持余留机制作为安全理事会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和确保追究责任的工具开展工作。

附件八

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阿巴里的发言

首先, 我谨感谢履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余留职能的国际机制的主席和检察官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

我国代表团赞扬余留机制迅速采取防范措施, 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保护其工作人员和所有被拘留者并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在这方面, 我谨就余留机制阿鲁沙安全人员死于病毒向该机制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不言而喻, 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不仅有助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也有助于防止和遏制新的犯罪, 促进和解, 以及满足受害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的愿望。然而, 只有有办法获得充足资金, 并在有效执行任务时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帮助, 余留机制才能实现为其设定的目标。因此, 我国代表团呼吁会员国按照12月22日第1966(2010)号决议的要求, 与余留机制开展充分合作。

在这方面, 我要赞扬法国当局、其他执法机构和余留机制采取行动, 使得菲利西安·卡布加先生于最近被捕。2011年,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指控他于1994年在卢旺达犯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

报告(S/2020/309, 附件)显示, 余留机制已经落实了内部监督事务厅在2018年和2019年提出的大部分建议, 并在余留机制各级职能中实现了性别均等的目标。它还表明, 检察官办公室的方法符合安全理事会在2018年6月27日第2422(2018)号决议中概述的期望。因此, 余留机制在执行任务方面取得的所有进展都值得赞扬和鼓励。

我国代表团赞赏余留机制保障被定罪者基本权利的努力, 并注意到在行政管理、判决执行、受害者和证人保护以及档案管理等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

最后, 我国代表团要再次鼓励余留机制的所有工作人员, 并在完成剩余诉讼方面, 敦促余留机制确保进行公平审判, 尊重正当程序和被告的人权。

我也要赞扬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越南和法律事务办公室在安理会和余留机制之间进行协调。

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天通过决议草案, 延长余留机制的任务期限并重新任命法官, 以便继续这项重要工作, 使正义得到伸张。

附件四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根纳季·库兹明的发言

首先,我谨欢迎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参加本次安全理事会视频会议。我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报告(S/2020/309,附件)。

2010年,余留机制作为一个“小型、临时和高效的机构”成立。我要强调该定义中的“临时”一词。该机制于2012年开始运作;因此,它已经活跃了八年,接受过两次工作审查,第三次审查正在进行中。

在这方面,我们本来期望2020年像余留机制负责人所说的那样,成为该机构的一个里程碑,所有案件都按规定时间表结案,安理会最终能够处理该机制的合法关闭问题。不幸的是,这一阶段尚未到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冠状病毒病(COVID-19)及其后果。

余留机制目前的两年任务期将于6月30日结束。到6月底,名册上的法官、主席和检察官的任期也将届满。本月,安全理事会正在审查该机制的工作,并将在决议中反映审查结果,通过该决议是将余留机制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两年的必要条件。

我们仔细研究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关于余留机制的结论和建议。它们证实了我国代表团多次提到的情况——安全理事会设立的刑事法庭本身没有司法规划系统,所有预测都是随机作出的。因此,检查员的结论,即:

“余留机制并未系统提出准确的预测,因为这些报告拒绝在诉讼开始时有序预测审判的未来进展或估计完成工作日期”(S/2020/236,第26段)

尤其重要。

我们完全支持监督厅的建议,即余留机制尽早在其报告中提供明确、重点突出的预计完成时间表并加以遵守。这项建议必须适当反映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余留机制审查结果的决议中。

我们明白,当前的情况极为不同寻常。尽管如此,我们敦促余留机制的管理层整顿局面,缩短预测完成审案的最后期限。我们期待今年取得成果。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尤其重要的另一点是,保护余留机制授权羁押者的权利,特别是及时获得合格医务援助的权利。我们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这方面的惨痛历史。在今天COVID-19疫情蔓延之际,这个问题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拉特科·姆拉迪奇健康状况不佳众所周知。因此,我们呼吁余留机制特别关注被羁押者的健康状况,为其提供适当的医务援助,并且积极考虑会员国主动提出的相应援助。

最后,我谨肯定余留机制检察官的工作,他查明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两名被告的下落,并在法国抓获其中一人即卡布加先生。在这方面,我们鼓励余留机制和安理会研究在不导致余留机制负担过重、不会无限期延长其运作的情况下伸张正义的各种可能。

附件十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因加·罗恩塔·金的发言

我谨感谢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全面通报。我们还和其他人一道，向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去世的两名阿鲁沙警卫的家人表示慰问。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的工作对于打击有罪不罚、保护和加强法治以及全面倡导国际司法依然至关重要。余留机制各项活动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些活动包括证人支持与保护方面的活动，监测移交国家司法管辖机构的案件，保存档案以及为会员国提供多方面援助等。

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挑战的情况下仍承诺确保业务的连续性。这场大流行病给完成多项司法活动的预计时间表造成不可避免的延误。但是，我们赞扬余留机制高效率地调整其工作方法，以适应这些情况。我们还肯定余留机制努力确保此刻羁押中人员的健康。我们相信，尽管COVID-19带来多种障碍，但是干扰将被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正当程序将得到确保。

我们注意到内部监督服务司的报告（S/2020/236）。我们对其评估称余留机制充分落实了2018年报告（S/2018/206）中所载的大部分建议感到鼓舞。尤其重要的是以下评估意见，即：全机制的性别均衡超过了标准，女性较多。尽管仍存在其它不足，但是这项成果令人钦佩。我们鼓励努力实现最近提出的建议。

我们肯定余留机制在落实旨在协调其两个分支的各种做法与程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此表示欢迎。余留机制继续努力优化活动，以寻求实现安全理事会的愿景，即：一个小型、临时而高效的架构。

我们注意到在有条件提前释放被定罪人员方面的司法判例发展。修订后的程序指示为规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非常值得欢迎。

余留机制的效力和整体成功依赖所有会员国的协助与充分合作。没有这些协助与合作，追查和抓捕逃犯的工作将严重受阻，判决的执行得不到保障，并且无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我们负有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共同义务，履行该职责不能浅尝辄止。

在此背景下，我们赞扬通过国际合作，促成菲利西安·卡布加在逃23年后被成功捉拿归案。也正是通过国际合作，得以确认逃犯奥古斯丁·比齐马纳的死亡。我们希望，继续协作将使我们找到并且逮捕所有六名剩余逃犯。在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继续逍遥法外时，正义是无法得到伸张的。在协助重新安置那些已无罪释放、居住在阿鲁沙的人员方面也需要国际合作。犒赏找到持久解决这个旷日持久问题的办法。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否认灭绝种族罪和美化被定罪战犯的行为。这种言论无视受害者，阻碍和解，鼓吹危险的理念。

最后，我们表示全力支持余留机制的工作。它在打击有罪不罚、追究对大规模暴行罪的责任以及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举足轻重。

附件十一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全面报告。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开展的工作令人称道,它还下大力气以多种方式改进自己的运作。正如在主席报告(S/2020/309,附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冠状病毒病(COVID-19)给余留机制的运作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就预期的时间安排及其对余留机制2021年拟议预算的影响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应赞扬余留机制采取措施,以确保继续运作和工作。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为确保余留机制的工作在COVID-19大流行病和必须远程工作的情况下继续平顺地进行,余留机制员工的工作堪称典范,并受到重要肯定。后台的工作人员常常被忽略,得不到应有的表彰。在这方面,南非谨向所有不懈努力以确保余留机制取得成功的人员表示深切感谢。

尽管存在多重挑战,余留机制在起诉肇事者和发挥余留职能方面的工作已经并且将继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这方面,南非谨强调为国家司法管辖机构提供的极其有益的援助。

南非谨祝贺法国成功逮捕菲利西安·卡布加先生。我们也参与了抓捕一名逃犯的工作,为此肯定法国的出色努力,并感谢与检察官办公室和它国的业务协调导致抓获逃犯。我们注意到,仍有六名逃犯逍遥法外,主席在其报告中指出,国家给予通力合作仍是一个挑战。

在这方面,主席报告说,检察官办公室于2018年年中寻求南非在逮捕和移交一名在其境内的逃犯方面给予合作,而南非直到2019年12月才努力执行援助请求。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南非国内法构成的挑战令人遗憾地限制了我们的合作。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此外,报告指出,2019年12月18日,检察官办公室向南非当局提交了进一步的援助请求——南非于2020年5月8日作出答复——但没有提供检察官要求的大部分资料。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确实向该办公室提交了两份报告——第一份于2020年2月19日提交,第二份于2020年5月8日提交。我们于4月告知检察官办公室,南非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实施的全面封锁可能导致推迟提交第二次报告。

南非重申,我们充分致力于与检察官合作。南非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我们的国家法律。我们一直努力与余留机制接触和合作。南非致力于履行《余留机制规约》第28条规定的义务。我们一直重申这一义务,并采取了积极步骤执行检察官的援助请求。我们仍然决心继续尽一切努力,与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并在可能情况下与其他相关国家合作,追踪和移交逃犯。卡布加先生可以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逃脱逮捕,据称他在多国之间流动,这再次强调,必须开展国际合作,防止嫌疑人逃脱逮捕。

关于在3月26日报告(S/2020/236)中提交的内部监督事务厅对余留机制自2019年10月以来的方法和工作的评价,我们祝贺该机制落实了各项建议,我们相信,两项尚未落实的建议将得到迅速处理。

附件十二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凯斯·卡布塔尼的发言

我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通报。

我们赞赏在阿吉乌斯法官的领导下,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正在努力实现安全理事会的构想, 即余留机制是一个小型、临时和高效的机构, 其职能和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

尽管该机制属于余留性质, 但它继续包含当代特设法庭有力和鲜活的遗产, 这些法庭是催化剂, 促进在全球永久追究暴行罪的责任, 并且推动在冲突后重建国内司法机构。

突尼斯赞扬余留机制工作最近的进展, 5月中旬在法国逮捕了卢旺达逃犯菲利西安·卡布加, 并确认奥古斯丁·比齐马纳已经死亡。我们赞扬法国当局为逮捕逃犯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还赞赏布拉默茨先生及其办公室坚持不懈做出起诉努力, 帮助查明了两名嫌犯的命运和下落。

由于余留机制以国家合作为前提, 各国必须继续向余留机制提供充分和及时的合作, 以便逮捕并审判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其余6名逃犯。

我们强调, 最贴近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的问责制必须成为任何可行司法模式的核心, 也是有意义的和解努力的核心。我们敦促余留机制保持朝这个方向一致行动, 使国际司法在国内也息息相关。

为那些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已宣告无罪或释放, 目前居住在阿鲁沙安全住所的人找到一个永久解决办法, 这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鼓励所有旨在帮助他们自愿和有尊严返回卢旺达的努力, 这是该国和解努力的一部分。

人们常说, 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然而, 我们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侨民中观察到的当前趋势与这种说法不同。再次出现否认种族灭绝和美化被定罪战犯的现象, 令人严重关切。我们坚决谴责这种试图破坏真相、持久和平与共存以及族群间和解的修正主义言辞。为避免我们忘记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发生是因为预警信号被忽视,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关注这些有害意识形态, 并相应地加以解决。

突尼斯认识到,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令余留机制的司法程序中斷, 打乱了完成这些程序的固定时间表, 此外, 预计将对其明年的预算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 我们敦促负责人通过实现规模经济、精简活动、找出可能存在的重叠以及促进余留机制两分支机构内部及其之间的合力, 进一步努力提高效率和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我们对余留机制保持总体性别平衡表示满意, 并鼓励它进一步加强地域多样性。我们还要强调, 随着COVID-19大流行病形势的发展, 必须向安理会提供清楚和有侧重点的完成时间表预测。

最后, 突尼斯期待余留机制进一步运作, 以便它继续如期望的那样, 高效和有效开展其重要工作。

附件十三

联合王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兼法律顾问苏珊·迪克森的发言

首先,我谨以联合王国的名义,对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的两名警卫死亡表示悼念。

我感谢余留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法官和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我谨重申,联合王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余留机制,并重申我们愿意尽可能协助该机制完成在6月30日之后延长的任务授权,并实现其作为一个小型、临时和高效机构的构想。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最近,今年2月,伊恩·博诺米勋爵被任命为余留机制法官。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一,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最近的报告(S/2020/236)认为,余留机制成功执行了监督厅过去的大部分建议,进一步改进了工作方法,并提出了两项新的建议作为机制的努力方向,我们完全支持这两项建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实施这些措施的工作已经开始。

第二,尽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余留机制仍确保了其工作得以继续,我谨支持余留机制主席的呼吁,请大家在此期间不要忽视国际司法的重要性。

第三,随着卡布加案的最新发展,余留机制迈出了一大步,表明不容有罪不罚现象大行其道。我们祝贺检察官办公室和法国当局上月在法国逮捕菲利西安·卡布加。联合王国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在最终实现逮捕的调查中给予合作的国家和实体之一。正如报告(S/2020/309,附件)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逮捕再次表明,国际司法如果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即使在事件发生几十年之后,仍能取得成功。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目前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国际调查工作队,其重点是欧洲境内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嫌疑犯。

我们欢迎第一起重大藐视法庭案——即“检察官诉图里纳博等人案”——取得进展。联合王国注意到检察官办公室在国际社会协助下为确认被告奥古斯丁·比齐马纳死亡所做的工作。现在仍有六名逃犯,一些案件需要某些国家采取具体行动。令人失望的是,一些会员国未给予合作,阻碍了检察官的努力。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协助余留机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该机制合作是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应承担的义务。

联合王国是协助余留机制执行判决的国家之一,希望其他国家也在必要时提供协助。我们注意到,主席通过修订《程序指示》,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以确保提高有条件释放的透明度和效率。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在重新安置仍居住在阿鲁沙安全住所的9名被判无罪并获释的人员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主席和书记官长努力解决这一难以为继的情况。我们呼吁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对余留机制在海牙推进姆拉迪奇案及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感到高兴,并注意余留机制做出各种努力,尽量减少冠状病毒病给这两起审判造成的延误。我们还赞扬余留机制与西巴尔干国家检察官一道开展能力建设。然而,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对区域司法合作仍然不足感到失望。仅仅是因为居住在邻国就可以逃脱法网,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呼吁西巴尔

干区域各国确保履行其在2018年伦敦西巴尔干首脑会议上签署《关于战争罪的联合声明》时所作的承诺, 致力于支持该区域在司法领域有效开展合作, 并消除这方面的障碍。

关于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事件, 令人深感关切的是, 各方美化战犯的行为仍在继续, 使和解变得遥不可及。个人和社会各阶层继续否认卢旺达和西巴尔干所发生的事件, 这是不可接受的, 联合王国将继续谴责一切形式的否认行为。

大约25年前,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 有八千名男子和男童被屠杀, 超过两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强行逐出该城。我谨代表联合王国, 悼念斯雷布雷尼察的所有遇害者, 他们始终是我们最缅怀的人。对于遇害者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行为,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现在的余留机制一直在为他们及其家属伸张正义。当然, 如果没有幸存者和证人勇敢地作证, 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没有他们, 正义就不可能得到伸张。我们必须确保此类事件绝不会重演。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本质, 即, 这是一起灭绝种族事件。

对于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可怕事件, 余留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各国必须继续支持它完成其工作。

附件十四

美利坚合众国代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谢里思·诺尔曼·查勒特的发言

我感谢阿吉乌斯主席和布拉默茨检察官的通报。我们感谢阿鲁沙和海牙以及基加利和萨拉热窝外地办事处的法官、律师和工作人员，他们辛勤工作、坚定承诺，一如既往地努力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但是，我们尤其感谢他们在目前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在我们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而调整我们工作方法的时候开展工作。我还要向在COVID疫情期间因COVID去世的工作人员的家属表示慰问。

美国愿祝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国政府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它们开展协作，促成在最近逮捕了卢旺达商人菲利西安·卡布加，此人被控实施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据称，卡布加先生是犯下卢旺达种族灭绝罪行的政治和民兵团体的主要资助者和支持者，也是臭名昭著的米勒·柯林斯自由广播电视台的创始人。

卡布加先生在逍遥法外26年后被捕，表明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及其工作仍然具有相关性。我们支持余留机制作出努力，确保对卡布加先生被控在卢旺达惨剧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审判。

我们还祝贺余留机制及其合作者确认长期在逃的奥古斯丁·比齐马纳已经死亡。我们将继续支持余留机制作出努力，逮捕因其在1994年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而仍被通缉的其余六名卢旺达人。美国继续悬赏高达500万美元，征集使任何剩余逃犯被逮捕、移交或定罪的信息。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国家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把这些因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罪行而被通缉的人绳之以法。

如上所述，全球疫情影响了联合国工作的各个方面，余留机制也不例外。我们认识到，庭审不得不推迟，我们赞扬余留机制在工作中努力遵守公共卫生准则。我们希望余留机制能够迅速着手处理姆拉迪奇上诉案，因为该案结案对受害者来说将是一个重要时刻。

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在斯雷布雷尼察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孩的种族灭绝事件中担任了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强奸妇女和女孩，炮击和狙击萨拉热窝平民，残酷对待穆斯林和克族囚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克族永久赶出波斯尼亚塞族声称拥有的领土这一骇人听闻的目标。我们再次提到这些，是为了重申诉姆拉迪奇案件的重要性，我们欢迎余留机制正在开展工作，努力继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裁定姆拉迪奇将军对战争期间所犯严重罪行的责任。

同样，我们肯定在重审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们因其在非法、强行将非塞族人驱逐出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方面据称扮演的角色而被控犯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关于检察官诉图里纳博等人案和检察官诉佩塔尔·约伊奇案和维丽察·拉代塔案中的藐视法庭诉讼，我们指出，干扰证人或企图以其他方式破坏法庭诉讼是对法治的严重威胁，必须严肃处理。

我们还赞扬余留机制努力支持从巴尔干到卢旺达的国家司法努力。这些程序对于确保即使当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起诉工作结束，伸张正义工作也不

会结束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 卢旺达在继续审判与种族灭绝有关的案件方面取得了进展, 我们也敦促巴尔干国家改善它们跨国家系统的合作。

我们还将大力支持延长余留机制的任务期限, 这是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指出的那样, 余留机制的工作对于司法仍然是至关重要、相关和关键的。我们敦促安理会支持延长任务期限, 因为余留机制的工作必须继续。

检察官继续提供令人深感不安的报告, 指出卢旺达和巴尔干否认种族灭绝和不接受历史真相的挑战仍在继续。我们无法让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死而复生, 但是, 如果我们在领导人试图把某些人变成社会弊病的替罪羊或否认历史事实时不采取有力行动, 我们将无法确保这些人及其亲人获得正义。

我们必须再次致力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的福祉, 并追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者的责任。余留机制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将继续支持它为受害者做出的努力。

附件十五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斯文·阿尔卡拉伊的发言

主席女士, 首先我要就法国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向你致贺。我们祝愿你在这个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蔓延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成功履行职责。

我还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和检察官分别提交报告, 并于今天作了全面的通报。我们感谢该机制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取得进展, 并在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下保持运作。

我们注意到, 余留机制在完成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剩余活动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我还谨强调, 余留机制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高效地顺利完成其任务, 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乃至本区域伸张正义、达成和解至关重要。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COVID-19疫情的爆发对安全理事会上次就该议题举行会议(见S/PV.8681)以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行动和活动造成了一些影响。同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管当局已采取一切负责任的措施, 遏制COVID-19的蔓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并规定进行强制隔离。

COVID-19疫情的总体形势, 以及为遏制这场大流行病而采取的适当措施, 给我国司法机构的工作造成显著影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和法院的工作尤其受到影响, 它们处理的战争罪案件最多、仍未审结且最为复杂。2020年4月30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根据我国目前的卫生状况, 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作出了新的安排。

主席先生, 我谨提醒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多年来一直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及其后续机构——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坚定而充分地开展合作, 它们的历次报告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样, 我们始终致力于为余留机制完成其任务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我们还谨再次承诺支持余留机制的工作, 并请所有会员国履行各自义务, 为该机制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提供协助。

我们谨强调, 我们赞赏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加强处理战争罪的司法机构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建设总体能力方面提供支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申, 我国以及邻国——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检察官办公室和相关当局必须根据国际司法和法治原则持续开展合作, 这对于调查和起诉战争罪至关重要。

最后, 我谨强调,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继续致力于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对战争罪负有责任者, 无论其国籍为何, 也无论其在政治或其他方面属于哪一派。我们还谨强调指出, 保护证人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司法机构而言都是首要事项。这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内的和解以及我们迈向欧洲联盟的道路都极为重要。向欧盟迈进是我国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 在我国各政党中享有广泛的共识。

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本国的司法系统。充分伸张正义意味着更大的信任、稳定和进步。

附件十六

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伊万·西蒙诺维奇的发言

我谨感谢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阿吉乌斯法官以及布拉默茨检察官今天的通报以及他们最近的报告(见S/2020/309和S/2020/416)。

今天,全世界正面临由我们的共同敌人——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造成的空前挑战,这场疫情已夺走许多人的生命。我们向COVID-19疫情的所有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同情。但在思念他们以及受到这场疫情及其后果危害的所有其他人时,我们也有共同责任永远不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包括针对克罗地亚的残暴侵略的受害者,在那次侵略期间,犯下了诸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罪行。遗憾的是,近30年后,大量受害者及其家人仍未获得期待已久的正义。因此,克罗地亚全力支持余留机制,支持它持续努力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的骇人听闻罪行的最突出实施者绳之以法。即将举行的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提醒我们注意余留机制开展的重大任务和重要工作。

克罗地亚同余留机制保持良好合作,定期答复其援助请求,例如检察官在起诉塞尔维亚国民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的案件中提出了援助请求,我们给予了答复。

除同余留机制合作外,克罗地亚还极为重视同本地区其他国家就涉及战争罪的问题持续进行合作。然而,只有各方都愿意并准备积极和公开参与,才有可能进行建设性合作。在这方面,我们赞赏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促成将一些案件移交给克罗地亚司法机构,而这些案件并非都是第二类案件。克罗地亚希望与塞尔维亚的合作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取得同样的进展,因为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合作水平并不令人满意。克罗地亚仍在等待塞尔维亚回应我们2019年9月发出的进行第四也即最后一轮谈判的邀请。我们希望这一轮谈判将导致敲定关于处理战争罪的双边协议文本草案。

关于余留机制目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我们充分意识到COVID-19疫情可能给正常活动和工作造成的困难。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余留机制将无法如先前规划那样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对拉特科·姆拉迪奇上诉案以及对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审判案进行的诉讼工作。我们再次强调及时审结所有未结案件的重要性。这对于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至关重要,因为拖延总会增加诉讼不以最终判决告终的风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案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我们敦促余留机制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克罗地亚欢迎上诉分庭于2020年2月对佩塔尔·约伊奇和维丽察·拉代塔藐视法庭案作出的裁决,该裁决确认塞尔维亚有义务执行余留机制有关逮捕和引渡这两名被告的命令。我们谨借此机会回顾,同余留机制充分合作是塞尔维亚与欧洲联盟(欧盟)谈判进程的条件之一,并呼吁塞尔维亚政府在这方面尊重和执行该裁决。

克罗地亚大力支持西巴尔干各国在充分遵守所有既定标准、包括同余留机制充分合作的基础上加入欧盟的愿望。在这方面,我们谨回顾,在克罗地亚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期间,由于COVID-19疫情,欧盟-西巴尔干萨格勒布峰会于2020年5月6日通过视频举行。欧盟领导人就《萨格勒布宣言》达成了一致,西巴尔干伙伴对该宣言表示了赞同。在《萨格勒布宣言》中,欧盟再次重申明确支持西巴尔干各国未来加入欧盟,西巴尔干伙伴则重申了把未来加

入欧盟作为坚定战略选择的承诺。《宣言》还明确指出,这一承诺的可信度取决于进行必要的改革。

克罗地亚欢迎安理会去年6月通过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的决议(第2474(2019)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源自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义务。失踪人员及查明其下落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之一。我们继续在各种场合处理这一问题。这样做具有区域和全球意义,而且还会改善持久和解的前景。为此,加强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包括开放所有档案——塞尔维亚仍未表明愿意这样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黑山的合作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认为,余留机制有很好的条件在这方面发挥支助性作用。

最后,我谨重申,克罗地亚将继续支持余留机制今后的活动。

附件十七

塞尔维亚共和国助理司法部长塞多米尔·巴科维奇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机会代表塞尔维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并参加为审议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定期六个月一次的工作报告(S/2020/309,附件)而召开的本次视频会议。

首先,我谨指出,尽管为阻止冠状病毒病蔓延宣布了紧急状态,但塞尔维亚仍尽可能迅速地通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我们将给予合作,并继续监视按照余留机制审判分庭裁决中规定的条件临时释放的人员。

25年来,一直努力通过国际司法机制来制裁南斯拉夫的血腥毁灭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塞尔维亚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它将前国家最高官员和军官引渡给了国际司法机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这样做。因此,不可得出妄图将最大责任归于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的修正主义历史结论。

简言之,其他国家没有自愿这样做,国际社会也未找到一个机制来迫使它们这样做。因此,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许多罪行仍未受到惩罚。这一事实给本机构的效力及其存在本身投下了阴影。

我们分析的仍是该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开展的工作的成果。不久前,2017年12月,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法庭)也不再存在。该机制不仅应终止剩余程序,而且应解决涉及服刑、程序的可能修改或档案的所有有争议问题,但尚未完全实现其中任何一项目标。

我仅谈谈在我国与余留机制合作中仍未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关于余留机制工作的第三次审查报告(S/2020/309)和六个月例行报告中可以看出,完成诉讼程序的时限已推迟到2021年4月。我认为这一延长是解决剩余问题的机会,这些问题迄今尚无答案。

我要重申,塞尔维亚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合作,让检方得以随意查阅所有证据、文件、档案和会见所有证人。与该机制的合作进展顺利。收到的所有请求几乎都已解决,最近的请求也正在解决之中。正在向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各分庭和余留机制书记官处及时提交塞尔维亚国家当局档案部门的答复和文件。已经免除证人保守国家、官方和军事秘密的义务。

在涉及塞尔维亚与余留机制合作的剩余程序中,约维察·斯塔尼希奇和弗兰科·西马托维奇案重审的初审程序以及拉特科·姆拉迪奇案的上诉程序正在进行之中。

我首先要谈谈判处监禁及提议在塞尔维亚服刑、提前释放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的人、犯人获释后受到某种非法监视和控制等相关问题。

很明显,解决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先前提出的问题的最后期限已经到期。我对这方面发生很大改变不抱希望,但是我也有责任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将其提交安理会。

第一个问题涉及不遵守2009年9月修订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的规定。关于刑罚的第24条第1款规定:

“审判分庭的处罚应限于监禁。在确定监禁期限时,审判分庭应遵循前南斯拉夫境内法院量刑惯例。”

所有人都可在该法庭网站上看到修订后的规约。尽管如此，法庭和余留机制仍将以下塞尔维亚公民判处无期徒刑：斯坦尼斯拉夫·加里奇、柳比沙·贝阿拉、武亚丁·波波维奇和兹德拉夫科·托利米尔。他们已对拉特科·姆拉迪奇作出初审判决，身为塞族人但非塞尔维亚公民的米兰·卢基奇和拉多万·卡拉季奇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此期间，塞尔维亚规定对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最高40年监禁。在此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法庭违反其规约作出了这些裁决。没有为此类对待提供申诉机制。

法庭在未遵守其创始文件所载规则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造成了深远后果，那就是在没有补救手段也没有任何这方面指示的案件中判处了长期徒刑。一些被判处无期徒刑者，即贝阿拉和托利米尔，在服刑期间死亡，因此，更加需要处理这种荒诞无理的法律行为。

塞尔维亚在2009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提议让被法庭判刑的塞尔维亚公民在塞尔维亚境内服刑。在这方面，我们尚未收到安全理事会的答复。服刑的获罪者当中最多的是塞族人和塞尔维亚公民。因此，塞尔维亚希望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应有之义吗？我认为，在余留机制任务期限结束之前，我们决不能让这个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第三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所拘押者的待遇制度因国家而异，这一点很不幸。在最发达国家，对罪犯的待遇要好得多，这些国家高度重视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这种高标准也反映在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囚犯服刑条件。法庭和余留机制均未能提出必须遵守的一般标准，相反，每个服刑地国家都是自作主张。

塞尔维亚准备承担义务和责任，执行海牙法庭所定罪的本国公民被判处的徒刑，并接受这方面的国际监督。塞尔维亚主管机构愿意作出明确保证，即没有余留机制作出的适当决定，不会提前释放获罪者。我们再次邀请余留机制的代表和秘书长指定的有关机构的代表访问塞尔维亚，参观其监狱设施，并亲自察看监狱条件是否符合要求。

第四个主要问题是改变服完三分之二徒刑者提前获释的条件问题。塞尔维亚坚持认为，这些条件应继续适用于被法庭定罪的塞尔维亚公民。

去年，塞尔维亚公民向余留机制主席提出的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后提前获释的请求大多没有得到解决，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2019年，以下塞尔维亚公民服满了三分之二刑期：拉迪沃耶·米莱蒂奇、斯雷滕·卢基奇、拉多斯拉夫·布尔德贾宁、弗拉斯蒂米尔·焦尔杰维奇和内博伊沙·帕夫科维奇。他们都提交了提前获释请求，都已年老而且身体不好，出于人道原因，不应该让他们的案件得不到法律解决。

2020年初，拉多斯拉夫·布尔德贾宁要求提前释放的请求被拒绝。塞尔维亚于2020年3月收到拉迪沃耶·米莱蒂奇、2020年5月收到斯雷滕·卢基奇的“表态要求”。采用了新做法，即国际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主席致函获罪者将要回到的国家，要求后者作出以下保证：如决定同意提前释放获罪者，其国籍国将接受余留机制规定的条件并监测这方面的遵守情况。塞尔维亚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这些表态要求作出了积极答复。

有条件释放是文明社会的一项法律成就。法庭前任庭长和余留机制前任主席在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情况下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当然,余留机制主席在作出提前释放决定时,有权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征求意见。

检察官和第三方在修订机制程序和证据规则方面施加影响是不可接受的。不幸的是,这种改变确实发生了。这样一来,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受到更大惩罚,需要面对程序障碍和漫长等待才能获得答复。

对这些请求所做的答复姗姗来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或说法。关于终止余留机制工作及其可支配预算的任何理由都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不能成为余留机制拖拉的借口。世界范围内的行政系统中的“行政沉默”被视为一种程序性法律方法,即不及时付诸实施,也就是不实施具有各种法律后果的行为。

第五个问题在最后,即罪犯被释放时才出现。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继续观察和监视这些人。包括本报告在内的六月期报告的正文提到否认和美化战争罪。每份报告都提到,有时指名道姓地提到,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判刑的已服完刑的人员公开露面。原因尚不清楚。通过宣布一项裁决,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已经完成。服完刑之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这些人进行进一步制裁,也不得剥夺他们的任何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特别关注在余留机制设在斯海弗宁恩的拘留所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的健康状况。

3月30日,塞尔维亚司法部长致函余留机制主席卡梅尔·阿吉乌斯先生,向他转达了她对姆拉迪奇将军在大流行病背景下接受手术的关切,尽管荷兰当局建议不要进行非紧急医疗程序,但他的家人后来才被告知这一点。即使是在以前的情况下,由于拘留所工作人员以及负责被拘留者的医务处人员采取了类似行动,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家人不得不进行干预。为保护姆拉迪奇将军的生命和健康,成立了一个国际医疗专家组。该小组的一致评估是,手术将对他的生命构成不必要的危险。幸运的是,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幸免于难。

一个特殊的问题是不执行法院决定。根据上诉分庭的决定,余留机制医务处被命令每周一次向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医疗组提供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信息。与该决定相反,关于他健康状况的官方报告对他的家人和医疗组是保密的,也就是说,秘书处不尊重上诉分庭的决定。拘留所管理人员的行为仍未得到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司法部长要求阿吉乌斯主席采取措施拯救一条人命,并维护法院裁决的权威,因为同一法院的行政管理危及这一权威。阿吉乌斯主席的答复是,就姆拉迪奇先生的健康而言,他的反应能力有限,这一权力已委托给上诉分庭,由该分庭在与姆拉迪奇先生有关的诉讼中作出裁决。此外,他指出,联合国拘留所的管理,包括向被拘留者提供医疗服务,是书记官长的一般责任。问题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同一法院的书记官处无视本法院的决定,而法院主席却不作任何反应,让其行政部门去处理,甚至要求尊重法院的决定。

第六个问题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档案的命运。塞尔维亚向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办公室、辩方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审判分庭提交了大量文件。塞尔维亚的总体立场是,提交给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后来提交给余留机制的文件,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诉讼中没有作为证据

提出的，应归还给提交文件的当局。要求归还文件的先决条件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刑事诉讼已经结束。

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具体的答案。我们发起这项伟大工作的提议没有得到余留机制官员的回应。归还文件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有责任记录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也是因为塞尔维亚相关机构提供了大量材料和进行了额外参与。无论如何，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它已被推迟到最后一刻，到了余留机制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让我指出区域一级的合作，这是相互理解、合作与和解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2019年11月16日至2020年5月16日期间，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两份起诉书，根据起诉书，一审法院的诉讼程序目前正在进行中。在同一时期，根据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前一时期的起诉书，作出了四项一审定罪。在二审程序中，一人被宣告无罪，两人被定罪。

与本区域主管检察官办公室的合作继续进行，交换了援助请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向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16项援助请求，其中6项请求获得批准，8项请求得到处理；由于形式上的缺陷，有两项请求未获批准。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18项援助请求，其中4项获得批准，14项尚未得到答复。

克罗地亚共和国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向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10项援助请求，其中4项请求获得批准；六项请求仍在处理中。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向克罗地亚共和国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七项援助请求，其中三项获得批准，四项请求尚未得到答复。

向普里什蒂纳的欧洲联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六项请求，但迄今没有一项得到答复。

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致力于加强战争罪起诉方面的区域合作。其代表在技术层面参加了2019年11月26日和27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区域会议，除塞尔维亚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黑山最高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国家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2019年12月17日至19日期间，塞尔维亚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了在萨拉热窝举行的检察官区域会议，来自本区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黑山——的检察官代表以及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首席检察官出席了会议。

5月14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席检察官戈尔达娜·塔迪奇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改善在具体案件中的区域合作。

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合作仍然是积极和建设性的。5月12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和余留机制首席检察官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对话的主题是检察官办公室在前一时期取得的成果、区域合作以及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和余留机制之间的合作。

2019年12月, 负责战争罪的副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参加了在海牙举行的介绍性培训, 在培训期间, 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的专家向他们传授了通过余留机制的工作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最近一段时间, 塞尔维亚共和国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继续请余留机制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为具体进行中案件提供必要文件。

目前仍在实施余留机制和欧洲联盟委员会的联合项目(国家检察官访问项目), 该项目使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代表能够作为联络官留在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工作, 他不断搜索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余留机制检察官办公室的数据库, 分出并提交与战争罪检察官办公室管辖范围内的诉讼有关的文件和证据。此外, 办案人员通过访问电子披露系统定期搜索数据库。

我认为, 在该机制工作结束在望之际, 安理会积极参与所有未决问题极其重要。塞尔维亚期待这些问题得到回答。

我将不下结论, 作为替代, 请允许我指出, 我认为我在发言中强调的要点足够有说明性, 可以使所有与会者得出结论, 即我国与余留机制的合作确实取得了成功。
